

《东极岛》导演管虎： 让真相永不沉没

■文/本报记者 李霆钧

由管虎、费振翔执导，朱一龙、吴磊、倪妮等主演的电影《东极岛》8月8日全国公映。

影片取材自中国渔民营救英军战俘的真实事件：二战期间，一艘位于中国舟山附近海域、载满英军战俘的日本货轮被击沉，上千名英军战俘被日军封锁于船舱内。绝境之时，东极岛上的一群渔民在惊涛骇浪中，为落难的战俘打开一条生路。

导演管虎在接受采访时表示，“最早促使我们写这个剧本，是中国普通人的血性、担当、善良”。但让他决定拍这部电影的“根本”，是发现在一些真实史料中，把这个事改了、变了。“希望通过这部电影，让真相不再沉没，让罪行无法被抹去。”

据悉，影片将于澳大利亚、新西兰、英国、美国、加拿大、中国香港及中国澳门地区等多地上映，其中将于8月15日在英国举行欧洲首映礼。此外，电影还计划于新加坡、柬埔寨、文莱、韩国、德国、法国、波兰、西班牙等地上映。



海岛文化、渔民群体值得“大写特写”

谈及拍摄《东极岛》的初衷，管虎透露，最早打动自己提笔写剧本的，是中国普通人身上那股子血性、担当和善良。但真正决心开机的“根本”，是发现有些真实史料被篡改了。他直言，当侵略者试图抹去罪行、编造谎言时，电影必须成为“对抗遗忘的武器”，“我们要让真相永不沉没，让这段历史被更多人看见。”

“国产电影里很少以渔民为主角，但这个群体太值得大写特写了。”在管虎看来，这段历史的独特性，在于它跳出了传统二战题材的宏大叙事，将镜头对准了“海上的普通人”。

海岛艰苦而危险的生存环境，孕育了渔民独有的精神特质——“向上拼搏、不服输、不怕死”。他们的救援不是刻意的英雄主义，而是“海上遇难者必救”的本能，不管对方是谁，生命永远排在第一位。这种朴素的价值观，在不同人种、语言不通的群体间碰撞出跨越国界的人道主义火花。

影片前期筹备，管虎遇到了很多常年生活在海上的人。不论需要被救助的是中国人，还是外国人，只要看到遇险的人，这些渔民都会伸出援手。“渔民救助是自然而然的一件事，是一个焕发自己生命力的故事，我觉得这个是有价值的，是应该给到观众的。这也是中国人骨子里非常优秀的传承。”管虎说。



拍摄的乐趣，在于挑战

管虎用“一部堪比三部”来形容《东极岛》的拍摄难度：水面、水下、海岛三个场景，每一个都是独立的技术攻坚战。这是中国电影从未面临过的挑战——水下拍摄无经验可循，水面要呈现沉船、战争、海难的宏大场面，海岛则需在真实的东极岛上重建村庄。

其中，水下戏份是最大的“拦路虎”。据悉，剧组曾试过干棚拍摄，但人在水里的肌肉反应、水流的自然状态，根本模拟不出来。剧组最终决定“边科研边拍”，演员们要接受魔鬼训练，静态闭气长达4分半钟，在威亚辅助下完成水下表演，一条戏拍完，往往身心俱疲。

管虎表示，下决心在水下拍，要承受很大的挑战。首先是演员的身体压力，需要经过特殊训练，然后是设备，以及完成的时候，水下特效、水下置景是否能够融合在一起，其中会有非常复杂的技术问题。“后来下决心还是这么干，边科研边拍。拍摄的乐趣，在于挑战。”

同时，剧组还在东极岛上实景搭建了村庄。管虎认为，实景搭建的好处，是让大家瞬间沉浸在真实环境中，每个演员、摄影、美术都会相信，这是件真事，这些真人。他说，“相信”两个字很重要，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相信，一船一船的石料运到岛上，搭这个村子，有可能是“费力不讨好”的，但它是真的。

演员表演将电影完成度提高一半以上

影片中，阿鲲、阿荡、阿花三位渔民的觉醒轨迹，构成了小人物在历史洪流中的成长弧光。管虎表示，阿荡是一个单纯的少年，他没有那么多想法，渴了就喝、困了就睡、恨了就反抗。阿鲲是独狼的性格，你别伤害到我，伤害到我就反抗。阿鲲通过一系列变动唤醒了骨子里的血性，除了家里的情情爱爱，小生小死之外，他觉得救援是一个大的民族性行为，这是阿鲲的觉醒。阿花身上展现的是普通人的觉醒，尤其作为女性，这种敢于反抗在那个年代是相当的了不起的一件事，而且她带领众人出海救援，这在剧作上起到了很大作用。

陈先生、李元兴等角色身上的“多面性”，更凸显了人性的真实。“他们会在枪口下胆怯后退，这太正常了，谁面对死亡能毫无惧色？但人性的光辉就在于，即便有弱点，依然能被事件激发舍生取义的勇气。”管虎认为，这种“不完美的英雄”才更可信，“就像你我在挣扎中选择善良，才是最动人的。”

为了让演员彻底融入渔民身份，管虎在造型上提出了极具地域特色的要求：夏天汗津津的、湿湿的、黑黑的，衣服基本上是浅的，主演是深色调的。最重要的一个造型元素是斗笠，在岛上，斗笠构成了一个整体造型，众人半遮面，让观众无法看清他们的面容。而后，所有人把斗笠摘下来，露出来，这些都是一个内心反应的呈现，这种造型本身就在“诉说”着故事。

在管虎看来，朱一龙是一位温文尔雅的君子，但为了角色，他希望朱一龙要增加一些“痞气、野劲”。而吴磊则在拍摄中完成了“从少年到男人”的蜕变：刚进组时像个孩子，杀青时眼神里全是担当，他和角色阿荡一起长大了。倪妮的“直觉式表演”也让管虎觉得非常珍贵，“她能瞬间投入角色，靠本能传递情绪，这种天赋太难得，每次都能感染整个剧组。”

从最终完成效果看，朱一龙、吴磊、倪妮的表现，让管虎赞不绝口。他直言，演员把电影的完成度提高了一半以上。



费振翔：拍摄《东极岛》，是一次深入骨血的情感共鸣

■文本报记者 李霆钧

人自发的人道主义救援，更显弥足珍贵。”谈及拍摄《东极岛》的初心，费振翔的话语质朴而坚定。当他第一次了解到里斯本丸事件时，便被深深触动——在自身命运未卜的乱世，东极岛渔民恪守“海上遇难者必救”的祖训，冒着生命危险为1800多名英军战俘打开生路。

在费振翔看来，渔民们长期被日军控制，习惯了压抑求生，但当1800条生命摆在面前时，他们选择了挺身而出。这种在生死关头的觉醒，不是一时冲动，而是中华民族“危难时刻有担当”的本能反应。“他们或许不懂什么叫‘国际主义’，但知道‘见死不救，对不起良心’。”

为了让这段历史在银幕上“活”起来，费振翔将“真实”二字贯穿创作始终。筹备期间，他埋首于20多摞厚厚的历史资料中，用两个多月时间梳理细节：这1800多名英军是哪个兵团的，日军都拿了什么物资，美军打了几发鱼雷，第几发击中，是第几分钟击中的，去救人的一共多少人，最大的几岁，最小的几岁……都需要全部了解清楚。费振翔说，这段发生在一天内的事件信息量极大，唯有把时间轴和细节打磨精准，才能让观众相信历史的温度。

看完这些资料，费振翔感觉自己亲身经历了一遍。然后就跟着编剧一起调整了将近一年的时间，核心始终围绕“视角”二字。“我们不改变事件本身，只聚焦渔民的内心世界。”他解释道，选择从渔民视角切入，是因为他们的救援并非刻意的“英雄主义”，而是“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”，既是对生命的尊重，也是对自身的期许。这种朴素的信念，在战争背景下升华为震撼人心的国际人道主义精神。

“我们是按照0.5稿算一稿计算，最后到17.5稿，才最终敲定。”他说。

拍戏着急到脚抓地 每天回家袜子是湿透的

拍摄过程中的挑战，远超想象。水下戏份是最大的难关——演员需要在威亚辅助下完成表演，静态闭气时间要达到3-4分钟。吴磊初下水时闭气仅40多秒，朱一龙虽有潜水经验，最初也只能坚持1分钟左右。但经过长期训练，两人都突破了身体极限。“我自己试过，不到40秒就心跳如鼓，他们的坚持让我敬佩。”费振翔回忆，水下拍摄时，导演与演员只能靠手势沟通，机器调度稍有偏差就需重新来过，“每天拍完戏，我的袜子都湿透了，因为急得

一直脚抓地。”但看着监视器里演员们在水中挣扎却坚定的眼神，他知道：“这种真实的张力，是任何特效都替代不了的。”

造型设计同样为“真实”服务。当朱一龙、吴磊以黝黑的皮肤、粗糙的质感出现在镜头前时，连剧组人员都差点认不出——有人对着朱一龙问“这是哪位演员”，有人觉得吴磊像“岛上土生土长的野孩子”。“造型成功的标准，就是让他们‘消失’在角色里。”费振翔说，这种“不像明星像渔民”的状态，恰恰是对角色最好的诠释。

影片中，阿鲲与阿荡的兄弟关系令人印象深刻。他们并非传统意义上“兄弟恭”的范本，却有着中国人最熟悉的情感表达，阿鲲默默为阿荡扛起生活的重担，把苦累藏在心里，只愿弟弟能过得更好。

“这像极了中国式的兄弟情，不善言辞却情深似海。”费振翔说，这种“藏在骨子里的温柔”，正是民族性格的生动写照，无需刻意修饰，便足以打动人心。

在真实的地方还原真实历史，才更有意义

“只有东极岛，才能拍《东极岛》。”这句话，费振翔重复了多次。他第一次登岛是在开拍前将近两年的时间，去看看真实的发生地到底是什么样子，而且得带着主创去感受一下，哪怕去吹吹风，闭上眼睛嗅一嗅，感受当时在海面上到底发生什么事。

登岛勘景时，船开到里斯本丸沉没的海域旁，内心被一种难以言喻的力量击中。船开到那片海域，左右偏差不到10米，费振翔仿佛能听见水下的故事。他在心中默默许愿：“你们在这安息，我带着团队来拍《东极岛》，是你们的故事，希望这部电影能够顺利。”

正是这份对历史的敬畏，让费振翔坚持在东极岛原址实景搭建渔村。当他和摄影师穿过杂草、越过水坝，在山坳里看到那个三面环海的村落时，夕阳下飞过的白鸟，瞬间让他“看清了电影该有的样子”。“就像诺兰坚持在敦刻尔克实景拍摄一样，真实的土地能赋予作品灵魂。”他说，尽管在岛上运输物资、搭建场景困难重重，但当剧组最终在原址复原出当年的渔村时，所有人都明白：“这份‘费力不讨好’，值！”

“只有东极岛，才能让我拍《东极岛》，这是一种力量，无法形容。我们最终做到了，我很开心。”费振翔说。



战争背景下的人道主义救援更弥足珍贵

“在战争阴云笼罩的年代，中国